

编者按

今年,是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、教育家、翻译家,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“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人”严复诞辰170周年。天津是严复的第二故乡,严复任职的北洋水师学堂旧址在河东区,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,深刻感悟先贤思想和精神力量,天津市历史学会严复研究专业委员会在津成立。我们特邀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,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、研究员罗澍伟先生撰写文章,深入探讨严复文化和精神思想,以飨读者。

首倡变革 爱国兴邦

罗澍伟



天津市历史学会严复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成立,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和意义。严复的生命,虽然仅只短暂的67个春秋,但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黄金时代,是在天津,是在天津河东区度过的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可以说天津是严复的“第二故乡”。严复把一生中“激情燃烧的岁月”,奉献给了天津;天津,也成就了严复与时代一脉相连的光辉生命旅程。当我们回味和感叹严复与天津的不解之缘时,也会深深地体味到他那“严谨治学、首倡变革、追求真理、爱国兴邦”的崇高精神,以及为救国图存,寻求富强之路,“勤奋学习、艰苦译著、勇于进取、敢为天下先”的非凡气度和胆识。严复在津期间,以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经典理论为武器,批判封建专制,宣传变法维新,提倡新学,反对旧学,成效颇大,影响至深。这一时期,实在是严复一生中最为辉煌壮丽的时期。严复也曾以此为骄傲,称自己是“卅年老天津”。

严复作为近代中国杰出思想家,作为站在历史潮头之上的文化巨人,虽然身处“从旧时代跨向新时代”的变局之中,却在这样一个人生的黄金时段,用自己熠熠闪光的先进思想,为中国人民照亮了一条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道路,为近代天津增添了霞光般的异彩,表现出“先进的中国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”。

“学好哲学,终身受用”

李润和



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阶段,即如何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。陈云曾说,到延安之前,他的讲话没有多少辩证法,到延安后,学了哲学,他的讲话就有了辩证法。他在延安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,还积极带头学习哲学,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。关于陈云在延安时期学习哲学并终身受益的事情,1981年,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也提到过:“陈云同志说,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,受益很大。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。他在延安的时候,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,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。”

在学习哲学和进行实践的过程中,陈云理论联系实际,学深悟透,慢慢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,这集中体现为“十五字诀”,即“不唯上、不唯书、不唯实、交换、比较、反复”。他认为,“不唯上、不唯书、不唯实”是唯物论,“交换、比较、反复”是辩证法,二者结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。“十五字诀”深刻道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:实事求是——“不唯上、不唯书、不唯实”,重在唯实,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,理论联系实际,做到实事求是;“交换、比较、反复”,旨在获得理性认识,而感性认识要上升到理性认识,离不开调查研究,弄清楚事实,归根结底还是要实事求是。

出于为党和国家事业的考虑,结合自身经历,陈云建议中央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。1981年3月14日,陈云和邓小平在谈话过程中,建议“中央提倡学习,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”,“希望能够组织政治局、书记处、国务院的同志都来学习哲学,并把这个学习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,也是自己的一项重要责任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:“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,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。”学哲学,用哲学,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,也是广大党员干部的职责要求。学好哲学,做政治上的明白人,不断提高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,更好地履职尽责——陈云的经历和建议,值得广大党员干部重视和借鉴。

《天演论》一经出版,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,当时正值中华民族危机之时,面对内忧外患,有识之士大力倡导变法图强,这部著作对于当时的变法运动起到了极大的启蒙作用,很快在当时的知识阶层中形成共识,大大激发起人们“救亡图存、振兴中华”的爱国潜能和时代紧迫感。

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了严复的译著,说严复“不是为翻译而翻译,而是借重译著,并通过序言和大量按语,表达自己的爱国思想和爱国主张,从而希望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”。

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,风气渐通,倡导西学之事日益增多,且以译书为首当其冲。最初是以“格致”(自然科学)类居多,因为当时只知道西洋各国的船炮利,认为“中国文物制度,事事远出西人之上,独火器万不能及”。严复《天演论》的问世和广泛传播使人们开始认识到,西方的强大缘于他们深合于“天演”趋势,中国为求存求强,必须适境自变,从此,“物竞天择之理,厘然当于人心,而中国民气为之一变”。严复以西方的进化论为武器,对专制和顽固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斗争,也使他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。

严复在维新运动中的又一贡献是创办了《国闻报》,这是近代天津第一份由中国人自办的报纸。

严复的政治论文在《直报》刊出后,反响极大,这使严复认识到自办报刊的必要。1896年,维新运动领袖梁启超在上海创办《时务报》,严复曾助款百元。此后,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,严复联合了志同道合的挚友,于1897年10月26日创办了易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的《国闻报》。不久,严复又创办了专为士大夫和知识分子阅读的旬刊《国闻汇编》,严复翻译的

《天演论》和介绍斯宾塞《社会学研究》的文章《斯宾塞尔(劝学篇)》,就是在《国闻汇编》上最先刊出的。

关于《国闻报》的办报宗旨,严复等人在该报的发行“缘起”中说得很明白:“阅兹报者,观于一国之事,则足以通天下之情;观于各国之事,则足以通中外之情。”这样一份以“求通”为目的,以“自强”相号召的报纸,适应了当时举国上下要求维新变法的新形势,不仅是“华人独立新闻事业之初祖”,还使天津成为宣传维新变法的强大舆论阵地。

严复利用《国闻报》这份报纸,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朝的腐败,对科举制度和八股文章大张挞伐,热情歌颂在地方上推行维新变法的官吏,对朝廷的种种新政举措进行大量报道,如议开制度局,筹办京师大学堂,奖励工艺制造,设立农工商总局,拟开懋勤殿以议新政……以及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访华和他与朝廷要员的问答,等等。后来有人评论说:“《国闻报》,侯官严几道先生复有合海内闻达,建设于天津者也。当戊戌年间,两人评鹭中国报界,以之为第一。”

1898年1月27日至2月4日,《国闻报》分9次刊登了严复写的《拟上皇帝书》。新政期间,经吏部举荐,光绪皇帝于1898年9月在乾清宫召见了严复,垂询经过,俱载于《国闻报》。

在这段时间里,严复以极大的政治热情,协助直隶总督王文韶办新式学堂“俄文馆”,培养俄文翻译人才,严复兼任总办,负责俄文馆课程的设置、教师的聘请以及馆内其他工作。严复还协助维新派人士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,他两次到学堂为学生“考订功课,讲明学术”,讲学内容为“西学源流旨趣”和“中西政教之大原”。百日维新时期,京师大学堂成立,不少人主张以严复为总教习。此事虽因守旧派的反对而未能实现,但也可从中看出,这一时期严复及西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。

拾遗

周恩来:用“狮子头”待客

周恩来拿自家烹制的“狮子头”盛情款待过日本乒坛名将。1964年10月的一天上午,他邀请当时享誉世界乒坛的球星松崎君代来家里做客。周恩来不往往松崎菜碟里夹菜。在一旁的邓颖超说:“这碗狮子头是我做的,周恩来最喜欢吃这道家乡菜,不知道对不对各位的口味。”说着从餐桌另一侧走到松崎面前,往她菜碟里夹了一块狮子头。松崎会后连声说:“味道真香。”

细心善良的邓颖超在听说松崎交了男朋友后,还特意送了她两条精心准备的大红绣花绸缎被面。而周恩来更是取出两瓶茅台酒,希望带给其父尝尝,并叮嘱:这种酒在60度左右,比日本的清酒要凶一些,但不伤人,味道也是很不错的。松崎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徐特立:10年破产读书计划

20岁时,徐特立遇到一个问题:没有书可读。他家里的藏书本来就很少,在偏僻的乡下想要借书也不容易,除了买书没有别的办法。但对于贫苦人家来说,当时书的价格昂贵,他教书一年可得十来串钱,还不够买一部《十三经注疏》。怎么办呢?他思来想去,想到了伯祖母留给他的那点微薄田产:能不能将教书所得的收入用以维持家庭开支,每年卖一点田产,去买想看、该看的书呢?他估算了一下,这点田产每年卖一点去买书的话,不到10年就会卖光,但是有了10年的勤学苦读,书也应该能够读通了。

思索再三后,徐特立将这计划跟妻子熊立诚说了。熊立诚犹豫后,马上表示赞同:“日子可以节俭点,但这书一定要读。”就这样,徐特立着手实施他的“10年破产读书计划”,卖田产买书读。有人笑他太傻,说谁不知道只有田产才是好东西,哪有变卖了田产来买书的?徐特立不以为然,毫不动摇地按照计划去做。

徐特立读书非常认真,书上的许多篆字不容易记熟,便坚持每天学习两三个字,晚上睡觉时还在掌上默写,直到写熟练了才入睡。那时候的代数、几何等新知识,很少有人懂得,徐特立学习中碰到不懂的地方全靠自己钻研。他常常把数学书放在衣袋里,先翻看一条定理,边走边默记,再翻看另一条定理。他读书不仅在书上画满各种记号,在空白的地方写上自己的意见和感想,还把主要内容摘录下来。他常对人说:“求学没有偷巧的办法,我用的都是笨方法。”

就这样,徐特立坚定不移地努力学习,收获非常大。他不仅把中国古代的经、史、子、集的主要著作都读了一遍,还学习了物理、化学、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和新的社会科学知识,成了一个知识丰富、很有学问的青年。

汪曾祺:为贾平凹做翻译

在中国文坛,贾平凹有“鬼才”之称,这个称号是汪曾祺送的。那是1987年在桂林,在漓江出版社组织的一次旅游文学笔会上,汪曾祺谈起贾平凹时评价说:“他一个很平易淡泊的人,却是一个难得的‘鬼才’。鬼才者,非凡才能之人也。”贾平凹随即作诗一首予以回赠:“汪是一文狐,修炼成老精……愿得沾狐气,林中共营生。”

1988年,贾平凹的长篇小说《浮躁》获美国“美孚飞马文学奖”。汪曾祺得知后格外开心,当即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《瞭望》杂志上,评价道:“平凹确实是一个很平易淡泊的人。从我和他的接触中,他全无‘作家气’,在稠人广众之中,他总是把自己缩小到最小限度。他很寡言,但在阅读中极富机智,极富幽默感。”

一次,贾平凹与汪曾祺在南京一起讲演。贾平凹慢条斯理,极为投入地讲了一个多小时,讲到中间时突然想起问听众:“我说的陕西话你们听得懂吗?”会场上几百张嘴巴一齐大声喊道:“听不懂!”贾平凹并不显得尴尬,而是幽默道:“毛主席他老人家不说普通话,普通话是普通人说的,俄(我)就不用说了吧。”

坐在一旁的汪曾祺立即接茬道:“你不会说普通话不要紧,我会说呀,这样,我来做你的翻译咋样?”感动得贾平凹连连说“行行行”。于是,汪曾祺便心甘情愿当起了临时翻译。贾平凹讲一句,汪曾祺翻译一句,两人相得益彰,配合得十分默契。

事后,贾平凹说:“汪先生是老前辈,但却没有一点架子,我说一句陕西话,他就翻译成普通话,有时还要解释,真是难为老人家了。就凭他对我的这份情,我不仅会记一辈子,也会永远把他作为我的良师益友。”

忽必烈:“发明”冰激凌

忽必烈一生征战,一统天下,建立了元朝。鲜为人知的是,他还是一位美食家。忽必烈称帝之后,以大都(今北京)为都城,当时的大都风貌同草原上大相异趣,夏

除了《天演论》,严复在天津期间和离津之后,还翻译了多种西方社会科学名著,包括:亚当·斯密的《原富》,约翰·穆勒的《群己权界论》(《论自由》),《穆勒名学》(《逻辑体系》),斯宾塞的《群学肄言》(《社会学研究》),甄克斯的《社会通论》(《政治史》),孟德斯鸠的《法意》(《论法的精神》),耶方斯的《名学浅说》等。这些译作对中国近代社会、思想、学术影响至钜,因而被尊为“严译八经”。1931年,商务印书馆把这些译作,辑印为《严译名著丛刊》,并收入《万有文库》。1981年,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该“丛刊”的新版本。

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严复,率先在中国译坛上提出信、达、雅的原则。他在《天演论》的“译例言”中说:“译事三难:信、达、雅。”“信”是忠实原著,使读者感到可信;“达”是译文通达顺畅,准确表达原著者的思想或情感;“雅”是要使译作有文采,有文学价值。近代著名古文学家吴汝纶高度评价了严复的翻译水平:“吾国之译西书,未有能及严子者。”“文如几道,可与言译书矣。”

严复是中国第一个将西方社会科学学说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,介绍给国人的。自从有了严复,西方哲学、社会科学才像潮水般涌入中国,这意味着西学东渐的主体内容已越过应用科学、自然科学阶段,进入哲学、社会科学阶段。严复对近代中国的文学、历史学、哲学、经济学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法学、教育学、翻译学等诸多领域,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,中国的社会科学能够发展到今天,严复的“启蒙”和“奠基”功劳,是不可磨灭的。

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全面总结和评价了严复,他说:“严复的一生,首先是爱国者的一生,他的一切寻求、一切进取、一切成功都是与其爱国之心、报国之志分不开的。”“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第一代知识分子的先驱,他爱国主义和追求真理的思想,他严谨的治学精神,他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学的严肃态度,代表了千千万万中国知识分子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走过的道路。”“严复的这些译著和评论,在当时因循守旧、故步自封的清王朝统治下的旧中国思想界,宛如巨石投入深潭死水,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。时至今日,严复的科学爱国思想仍不过时。”

百余年前,对于中西文明如何在同一地球共存,国民还处于迷茫、困惑的阶段。作为时代先行者的严复,以开放包容精神首倡变革,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、理解的桥梁。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,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。严复的每一次尝试,都让我们距日后的成功,更近了一步。这也正是直到今天,我们仍然要纪念严复、不能忘记严复的原因所在。

季天气酷热,生鲜食物保存十分不易。这对喜爱喝奶的忽必烈和蒙古贵族来说实在是件恼人的事,新鲜的牛奶奶,放几个时辰就变质了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忽必烈灵机一动,想到在牛奶中加入冰块,以延长牛奶的保存时间。

这个无心之举却让忽必烈有了意外发现:牛奶和冰块融合之后的“奶冰”味道比鲜牛奶更鲜美,后来忽必烈在“奶冰”中又加入了蜜饯、水果等佐料,使“奶冰”的颜色更鲜艳,口味更好。此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·波罗到中国旅行,受到忽必烈的接见与赏赐,忽必烈兴高采烈地把只有贵族才能享用的“奶冰”赐给马可·波罗,马可·波罗便将它的制作工艺带回欧洲,经过改良,形成如今受人喜爱的冰激凌。

较完整的排水系统:有些城市古代已经具备

中国古代城市很早便开始运用沟渠疏排城内积水,在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中都发现有较完整的沟渠排水系统。学界一般认为,西周至战国时期,城市沟渠排水系统已经较为完善。

中国历代都城都有系统的沟渠网络,汉长安城大道旁皆有沟渠,环绕城市的城墙底部有城内向城外排水的圆形陶管道。元大都初建时,便凿有七处泄水沟。考古调查,在今西四牌楼附近地底发现石砌明渠,宽1米、深1.65米。明代北京城内沟渠众多,据侯仁之统计,见于记载的城内主要沟渠有大明濠、东沟与西沟、东长安街御河桥下沟渠、龙须沟、虎坊桥明沟等。光绪《顺天府志·京师志》中载乾隆五十二年,内城沟渠有“大沟三万五千三百三十三丈,小巷各沟九万八千一百余丈”,折合今里程约400公里。都城之外,地方城市的沟渠系统亦相当完备。如清代重庆有贯穿全城的17条水沟,只是这些水沟现早已多不见踪影。

爱因斯坦:对声讨者不屑一顾

爱因斯坦的“相对论”发表之后,有人网罗了一批所谓名流对这一理论进行声势浩大的挾伐,并炮制了一本《百人驳相对论》。爱因斯坦对这些声讨者不屑一顾,他说:“假如我的理论是错的,1个人反驳就够了,100个人加起来,还是零。”